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 内涵、开发原则与核心特征*

杨莉芳

摘要：建设深度融合信息技术、适应互联网时代学习需求的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是教育数字化战略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通过提炼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本质属性界定其内涵，然后阐述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开发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核心特征，期望能为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开发、研究与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形态教材；大学英语教学；内涵；开发原则；核心特征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form material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at deeply integrat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Internet era is a prime requirement of the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notations of new-form material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by refining their essential attributes, discuss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ir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ir core feature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of new-form materials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 words: new-form materials;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onnotation;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core feature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12(2024)01-0057-08

1. 引言

新兴科技的高速发展推动了全世界重新思考教育，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的新模式。2024年1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发展数字教育、推进教育数字化是教育发展所需、教育改革所向。教材是教学活动的载体，新形态教材建设是教育数字化的重要方面。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指出，要适应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态势，满足互联网时代学习特性需求，建设高等学校新形态教材。《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强调积极推进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建设。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研究具有现实的高校英语教学实践需求和应用价值。本文在梳理分析教材研究文献和前期院校调研结果的基础上，提炼与探讨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内涵、开发原则与核心特征，为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建设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

2.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内涵

大学英语教材的形态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从“书配光盘”到纸质内容数字化，反映了教材内容呈现的多媒体、多模态趋势。教材内容呈现的形态变化仅囿于外在形

* 本文系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建设与使用研究”(编号220601339012507)和国家大中小学外语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外国语大学)项目“全球外语教材研究与资源建设:多维视角下的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编号2022SYLZD014)的阶段性成果。

式,而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形态教材的形式和内核更能体现教材内在逻辑的变革。近年来,有研究者围绕新形态教材开展了相关研究,发现新形态教材具有以下本质属性。第一,物理形态丰富性。新形态教材涵盖纸质教材、数字教材、电子教案、电子图书、试题库、资源库、数字课程、网络平台等多介质(Mishan & Timmis 2015;徐劲 2021),是通过对教学内容、富媒体教学资源、学习工具和技术平台的有机整合(Grönlund *et al.* 2018;曾斌,刘海溧 2023),为教学活动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的教学材料(李宝贵 2023)。第二,教材内容智能开放性。新形态教材的知识内容灵活组装、个性生成、便于更新、动态发展(Pešut 2018;雷小青,覃圣云 2021;付艳芳等 2022)。第三,学习环境智能交互性。新形态教材实现学习者与教材内容交互、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机交互以及师生、生生之间的同步或异步人际交互,打破传统教材与学习者之间的单向信息流动(黄明东等 2022)。第四,课程目标导向性。新形态教材具有以课程目标为根本出发点的特性,能更有效地服务学科人才培养目标及培养方式(付艳芳等 2022;李宝贵 2023)。

依据新形态教材的本质属性,笔者尝试将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内涵阐述为:面向大学英语课程人才培养需求,纸质材料、数字化资源、配套软件平台等多介质材料一体化设计的智能化大学英语教材。

3.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开发原则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英语教材编写需遵循的原则,其中的基本共识包括紧密联系所服务的课程、有利于学生的能力培养、选材真实等(Tomlinson 2013),反映出教材开发应关注课程教学、学生学习与材料性质。结合数字时代的知识观与教学理论发展,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开发须着重遵循下列基本原则:服务混合式新形态教学模式、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融合信息技术与多种介质。

3.1 服务混合式新形态教学模式

混合式教学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优势,突破时空局限,成为“互联网+”高等教育模式下大学英语改革的必然趋势(黎宇珍等 2022)。从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现状来看,大学英语课时压缩是客观事实。如何在课时缩减的情况下,确保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混合式教学提供了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现有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实践多由教师基于自己的具体课堂开展(如胡苑艳,曹新宇 2021),适配的教学材料缺乏。笔者的前期院校调研结果显示,教师使用传统教材的混合式教学探索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教学效果也不一定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教材并不具备混合式教学资源应有的特点与功能,另一方面教师的课程与教学设计能力存在差异。因此,新形态教材在开发之初就须瞄准混合式教学模式,根据线上与线下教学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既服务混合式新形态教学,又发挥教材的工具作用,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3.2 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

传统教材出版之后即成为相对不可更改的静态存在,不同地域、教育水平、教学进度的课堂均使用同一本教材。这是因为传统教学理念下,课本是知识的载体,一旦所需传授的知识确定,教师根据教材施教即可,而教学情境、学生个体差异等并未得到充分考虑。数字时代外语学习范式从“知识获取”转向“知识创建”(杨港,彭楠 2021)。新形态教学注重满足学生差异化和个性化学习需求,构建学生与资源之间的交互空间和渠道。由此,新形态教材也须推动学习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基于大数据技术,教学全过程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即时评价反馈利于个

个性化内容推送和个性化精准教学实施,从而实现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极富个性特征的“千人千面”学习(徐劲 2021)。

3.3 融合信息技术与多种介质

新形态教材的开发需要对纸质材料、数字化资源、配套软件平台等多介质材料进行一体化设计,设计的前提则是技术助力。信息技术在新形态教材开发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教学材料与内容创建,教学内容可以是数字课本、视频微课、虚拟现实操作等,实现情境化外语教学。其二,智能伴学与反馈,通过知识图谱、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人机互动,辅助学习者的知识摄取、口头交流、书面产出,并通过语音识别与测评系统、智能写作评阅系统等实现对学习者口头与书面产出的评估反馈。其三,数据驱动决策,一方面自适应学习工具根据学习者表现数据自动生成与推送适切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后台抓取学习行为大数据分析学习特点,并将其提供给教师与学习者用于教学活动决策。新形态教材创设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新一代数字化智慧学习环境,关联多介质、多元素,形成数字生态系统(Godwin-Jones 2016),实现基于人工智能的交互式学习(祝智庭等 2022)。

4.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核心特征

结合新形态教材的内涵和开发原则,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将完全区别于传统教材,具备适应数字化教学的显著特征。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核心特征包括线上线下融合设计、集成性动态发展和教学共同体创设。

4.1 线上线下融合设计

新形态教材线上线下融合设计的特征反映了服务于混合式新形态教学的开发原则。此处的混合式新形态教学可被称为融合式教学(沈欣忆等 2022)。初代混合式教学实践中“线上”与“线下”简单相加,即将传统教学的一部分(主要是课前预习和课后作业)转移到线上。混合式新形态教学则是将不同层次教学目标涵盖的内容、活动与不同教学形式相匹配,线上模式和线下模式有机相结合,两者互相关联、承接和推动,实现教学效应最大化。因此,在融合式教学模式下,新形态教材对教学内容与样态进行前置性设计,在设计中将教学活动与教学目标相对接。

4.1.1 内容与样态前置性设计

近年来,为满足线上教学与混合式教学的需求,大学英语教材开发已经有所发展,数字化教材是表现形式之一。数字化教材的设计是在纸质教材的基础上,将一些教材元素表现为数字化形式,比如介绍核心概念或知识点的微课、电子版输入性材料、增补的视听材料等,属于对纸质教材的数字化改造(鲍敏,李霄翔 2017)。这种设计的优点是教材数字化效率高,能在短期内迅速产出可用于教学的教材成品。但是,纸质教材先行、数字资源后配也存在先天不足(赵舒静 2018)。由于未能在教材设计之初便将线上与线下教学的特点纳入整体考量,难以实现线上与线下教学的无缝衔接、有机融合。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在开发之初即以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教学框架,根据线上教学、线下教学的情境与特征,对教学内容和活动样态进行前置性统一规划与设计。线上与线下教学的优势在新形态教材中得到充分体现:线上教学不受时空限制、可回看,便于外语学习中的反复操练;线下教学师生实时交互,促发直接、真实的文化和思想层面的交流互动。新形态教材的合理设计使得线上与线下教学优势互补、彼此赋能,更有效地推动教学活动进程,满足混合式新形态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全方位教学需求。

4.1.2 目标与活动特征为参照系

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的根本不在于追求形式创新(Vaughan *et al.* 2017),而是探索获取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最优解。教学目标始终是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教材研发、教学设计的基础和依据。新形态教材在设计教学内容与教学活动时以培养目标为准绳,探求混合式教学中如何更有效实现教学目标。线上线下融合设计的参照系由课程培养目标与学习活动的特征构成,以目标为横轴,以活动特征为纵轴,定位每项目标最适配的教学方案,进而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活动形式。

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大学英语教学的能力目标包括英语的应用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等(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2020)。《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提出,大学英语课程的思政教学目标主要包括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方面(赵雯,刘建达 2022)。大学英语教学应分析厘定每项能力和素养目标的内涵与核心要素,将其具化为可教、可学、可测的教学内容与活动单位。例如,根据 Deardorff(2006)的跨文化能力模型,跨文化能力包含态度、知识与技能三个维度,每个维度又下含组成元素。相应地,教材研发需要考量每个维度的各个元素如何落实至线上与线下的教学活动。

线上与线下学习最大的差异在于活动的时空性特征:前者时空分离,即师生、生生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开展教学活动;后者时空共存,即师生、生生共处同一时空开展教学活动。在时空分离型教学活动中,学习者拥有更多的独立自主权,能够自我规划、调整学习的内容和节奏;在时空共存型教学活动中,即时互动更能使学习者获得深层认知发展,产生情感共鸣和群体归属认同。根据认知负荷理论(Feldon 2007),一次性过量信息输入、学习焦虑和规则约束都会导致认知负荷过大,而认知负荷只有在学习者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才能让有意义的学习顺利发生。因此,对于知识摄取类的教学目标而言,学习者自主性更强的时空分离型教学活动能够发挥较好的作用。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课堂教学研究发现,互动过程中激发的反思会促进深层认知发展(Turuk 2008),因此对应高阶思维层级的目标可融入线下教学活动。另有实证研究表明,线下教学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情感认同(Patchan *et al.* 2016),所以属于内生层面的能力目标(如跨文化能力中的态度、思辨能力中的情感倾向)及价值观相关培养目标也可通过线下教学活动实现。

4.2 集成性动态发展

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集成性动态发展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得以实现。个性化需求各有不同,意味着新形态教材应是开放、未固化的,但与此同时,新形态教材的研发又是前置性设计,二者看似一对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形态教材可以提供成型的核心元素、有选择的组合方式及可自由创造的教学空间,体现为教学模块的按需集成和多介质教学材料的动态生成。

4.2.1 教学模块按需集成

经典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每堂课都由必要的教学环节按序构成,每个教学环节都包含内容载体与活动形式,教材相当于行动方案,教师相当于执行者。传统教材提供的是线性方案——从第一单元到第八单元、从 Text A 到 Text B、从“Lead-in”到“Explore beyond the Text”,所有材料和活动都环环相扣,呈现紧密的逻辑性。教师在教学中顺畅的教材使用方式是完全执行教材方案,但这往往不可能,因为每位教师面对的学情都不同,甚至同一位教师面对

同一学校同一年级不同班级也不能使用完全相同的教学步骤。由此,教材使用成为事关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师应根据教学对象通过增、删、改等不同方式调整教学内容和活动。然而,传统教材提供的线性方案下,教学内容与活动之间联系紧密,相关改动须经审慎考虑,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不仅可能损害教学的完整度,而且会使教学内容逻辑松散,不利于明确教学主次。

新形态教材为教学内容和活动提供“预设的教学模块+可选的连通路径”,教材使用者可按需集成。每个教学模块由具体教学目标、教学材料、教学活动、评测方案构成(Lazarinis *et al.* 2019)。教师与学生可以根据实际需求,以教学目标为主要抓手选择教学模块,根据教学活动的模态(线上或线下)将模块组装起来。教材同时提供多种组装方案,并标识每种方案的逻辑顺序与预期效应。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按需集成具体表现为:基于语言学习与外语教育理论判别教学模块的粒度,每个模块兼具相对独立性与可组装性;依据教学实践情境提供教学模块的目的、类别、难度等元数据标签(郭文革等 2022);根据外语学习规律提供可行的集成逻辑路径。通过按需集成,新形态教材形成有意义的大学英语教学系统,实现智慧教学。

4.2.2 多介质材料动态生成

依托信息技术,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由不同介质的材料构成。但是,新形态教材并不停留于表面形式的多样化,而是通过科学设计实现材料之间的分工协作、连通共创,催生新型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有效实现课程培养目标。

多介质材料既可根据各自不同的特性匹配相应的教学内容,也可通过复现设计提供更多个性化学习的选择。教学内容匹配方面,可根据教学目标,设定教学材料介质维度。对于外语教学的技能型目标,可设计学生能够自主完成的活动形式,并提供相应脚手架及学习表现的诊断与反馈(Patchan *et al.* 2016)。材料设计可以具体分析技能媒介偏向口头还是书面、技能构成是单一还是综合、情境是独立还是交互。例如,针对阅读能力训练,教学输入主要是文本材料供学生独立阅读,在电子文本的基础上可集成词汇查询与自适应语言学习工具、多媒体注释工具等(Liaw & English 2017)促进词汇能力、阅读能力提升;也可设立留言互动区,学习者能够基于材料思考与理解进行提问、回答,增强高阶思维能力。针对听说能力训练,技能构成更为综合,情境更具交互性,材料以视听方式输入,利用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人机对话的模拟交流场景。对于知识型教学目标,抽象概念可通过知识讲解型微课学习,具象文化可采用虚拟仿真技术实现体验式学习,语言特征与规律则可利用语料库技术使学习者通过接触大量真实语料习得(Heift & Vyatkina 2017)。对于价值素养型目标,可采用角色代入案例分析的方式,通过信息技术渲染、直播社区等增加学生的临场感。各种介质的材料不仅可用于不同形式的教学,也要相互配合。比如,类似内容的多种介质复现既能提升学习效果(Patchan *et al.* 2016),也便于学生根据偏好选择学习方式。

新形态教材还为师生提供可自由创建的教学空间,将教学过程中动态生成的材料纳入教材系统。动态生成包括创造生成与加工生成。利用教学平台工具,教师与学生可根据现有相关主题或话题,创造生成新的文本、视频、播客等(Lee & Egbert 2016)供教学使用。学生的创造生成有助于增强学习动机,拓展学习内容边界,满足个性化发展需求,培养探索性学习能力(Lomer & Anthony-Okeke 2019)。教师与学生对教学材料的加工生成分为教授型加工、学习型加工和互动型加工。教授型加工包括教师生成的注释、提问、点评,学习型加工包括学生针对学习内容产生的笔记、问题、回答,互动型加工包括师生、生生讨论形成的认识、观点等。基于

新形态教材体系,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生成性资源并非零散无序地存放,而是与教材中的给定内容紧密关联,供教材使用者随时访问、修改与更新。

4.3 教学共同体创设

新形态教材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和多介质资源载体,能为大学英语教学创设教学共同体。一方面,通过人机协作,教师能够更有的放矢地实施高效教学,学习者能够获得更契合个体特征的学习和发展体验。另一方面,人机、人际的多维交互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拓展,师生在协作、交互与创造的环境中获得成长和发展。

4.3.1 技术助推人机协作

新形态教材通过深度融合信息技术推动人机协作,实现外语教学中教学评一体化与人工智能辅助的外语学习。

教学评一体化的教学实践很大程度上依赖教材设计。传统大学英语教材中形成性评价活动设计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为缺乏基于诊断的反馈与后续针对性行动(杨莉芳 2023)。新形态教材结合应用智慧教学平台、数据信息技术,在通过评价赋能教学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智慧教学平台收集教与学的全过程数据,分析学习者学习表现、行为特征、能力现状等,分析结果可用于不同场景的教学活动。对于指向低阶教学目标的活动,平台通过人工智能自动评价诊断教学效果,并根据评价结果做出学习决策,比如推送语法词汇自适应学习内容(Ma 2017)。对于指向高阶教学目标的活动,平台提供数据分析结果和方案建议,帮助学习者跟进处理已完成的学习任务(修改、重做、反思等),计划下一任务,以及改进学习策略。平台提取所记录的实时与历时数据,随时准确评价学生特定时段的学习行为,如活动参与度、具体目标能力的发展变化,帮助教师实施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学习指导,反思和调整整体教学安排,以及开展教学研究。此外,对于班级、年级、院系等集体的过程性数据均可根据需求实施建模分析,赋能教学管理和课程改革。

4.3.2 数智赋能多维交互

智能化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智慧学习环境实现人机、人际多维交互,既贯彻探索性、合作性学习及以能力为导向的外语教学理念(孙有中,王卓 2021),又在外语教学中提升教材使用者的数字素养,推动数字化时代人才培养。

学习者的在线探索性自主学习通过与材料、平台的互动完成。多介质材料给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学习选择权,可增强学习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材料动态生成的开放性教学系统中,学习者可以加工和创造生成新材料,提升自身的学习参与感与学习动机,发展创造性学习能力。借助平台生成的学习表现数据分析结果和诊断反馈,学习者能够提高学习的目的性与策略性(李绿山等 2022),促发反思性学习,提升学习能力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者通过学习使用新形态教材基于人工智能技术集成的自然语言处理等各种工具,也可同步提升语言能力和智能工具的有效应用能力。

新形态教材包含的智慧学习平台还能拓展人际互动边界,使全天候、全空间人际交流与协作学习成为可能,师生、生生在时空分离的情境下仍可围绕特定内容、问题或项目进行互动,开展合作学习,促进知识的分享与创造。新形态教材的使用也必然推动大学英语教师发展。人机协同教学模式下,教师需要发展智慧教学能力,提高数字素养,善用智能技术为教学服务(祝智庭等 2022)。新形态教材作为多介质的综合体能为教师提供在实践中学习的资源环境,实现做中学、用中学。通过新形态教材集成的数字化教学设计工具,教师能够设定、分析、反

思、分享教学内容和方法,评价和学习其他教师的教学设计,建立教学共同体,促进协作发展。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的内涵、开发原则与核心特征。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面向大学英语课程的人才培养需求,是对纸质材料、数字化资源、配套软件平台等多介质材料进行一体化设计的智能化教材,开发原则主要包括服务混合式新形态教学模式、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融合信息技术与多种介质,具有线上线下融合设计、集成性动态发展和教学共同体创设的核心特征。

新形态教材是教育理念发展结合技术应用的产物,并能推动教育教学观念与实践革新。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将深化信息技术发展成果应用,展现出更强的数字化、智能化特性。在这一发展趋势下,大学英语新形态教材设计与使用中的教师、学习者和人工智能三者的关系有待深入探讨,以促进技术应用赋能学科培养目标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 [1] Deardorff D. Identific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s a student outcom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2006, 10(3): 241-266.
- [2] Feldon D F. Cognitive load and classroom teaching;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automaticity [J].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007, 42(3): 123-137.
- [3] Godwin-Jones R. Culture,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A]. In Farr F & Murray L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C]. London: Routledge, 2016. 173-184.
- [4] Grönlund Å, Wiklund M & Rickard B. No name, no game; Challenges to use of collaborative digital textbooks [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18, 23(3): 1359-1375.
- [5] Heift T & Vyatkina N. Technologi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L2 grammar [A]. In Chapelle C A & Sauro S (eds.). *The Handbook of Techn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7. 26-44.
- [6] Lazarinis F, Karachristos C V, Stavropoulos E C & Verykios V S. A blended learning course for playfully teaching programming concepts to school teachers [J].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2019, 24(2): 1237-1249.
- [7] Lee H G & Egbert J.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in varied technology contexts [A]. In Farr F & Murray L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chnology* [C]. London: Routledge, 2016. 185-196.
- [8] Liaw M-L & English K. Technologi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L2 reading [A]. In Chapelle C A & Sauro S (eds.). *The Handbook of Techn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7. 62-76.
- [9] Lomer S & Anthony-Okeke L. Ethically engag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ent generated material in an active blended learning model [J].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2019, 24(5): 613-632.
- [10] Ma Q. Technologie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L2 vocabulary [A]. In Chapelle C A & Sauro S (eds.). *The Handbook of Techn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7. 45-61.
- [11] Mishan F & Timmis I. *Materials Development for TESOL*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2] Patchan M M, Schunn C D, Sieg W & McLaughlin D. The effect of blended instruction on accelerated learning [J]. *Technology, Pedagogy and Education*, 2016, 25(3): 269-286.

- [13] Pešut D. A conceptual model for e-textbook creation based on proposed characteristics [J]. *Information and Learning Science*, 2018, 119(7/8): 432-443.
- [14] Tomlinson B. Developing principled frameworks for materials development [A]. In Tomlinson B (ed.). *Developing Materials for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 [C]. London: Bloomsbury, 2013. 95-118.
- [15] Turuk M C. The relev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Vygotsky's sociocultural theory in the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 [J]. *Annual Review of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 Language Sciences*, 2008, 5: 244-262.
- [16] Vaughan N, Reali A, Stenbom S, Van Vuuren M J & MacDonald D. Blended learning from design to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of evidence-based practice [J]. *Online Learning*, 2017, 21(3): 103-114.
- [17] 鲍敏,李霄翔. 信息化环境下数字化大学英语教材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2017,(3):80-84.
- [18] 付艳芳,杨浩,李小霞. 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开发的必要性、基本要求与实施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2022,(8):23-27.
- [19] 郭文革,杨璐,唐秀忠,李海潮. 数字教学法:一种数字时代的教学法及一种教学法的数字教材[J]. 中国电化教育,2022,(8):83-91.
- [20] 胡苑艳,曹新宇.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中的同伴中介研究:活动理论视角[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4):124-135.
- [21] 黄明东,蔺全丽,李晓锋. 高校新形态教材的特征、发展态势与建设路径[J]. 出版科学,2022,(2):32-39.
- [22]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Z].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 [23] 雷小青,覃圣云. 高校教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辩证思考[J]. 社会科学家,2021,(11):146-150.
- [24] 黎宇珍,贾积有,蒋学清. 国内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研究述评与展望(2001—2021)[J]. 外语电化教学,2022,(3):58-63.
- [25] 李宝贵. 国际中文教育新形态教材建设:内涵特征、现实挑战与推进路径[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23,(3):15-25.
- [26] 李绿山,赵蔚,刘凤娟. 基于学习分析的大学英语网络学习可视化监控和反馈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2022,(2):23-31.
- [27] 沈欣忆,苑大勇,陈晖. 从“混合”走向“融合”:融合式教学的设计与实践[J]. 现代教育技术,2022,(4):40-49.
- [28] 孙有中,王卓. 与时俱进,开拓中国外语教育创新发展路径——孙有中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2021,(4):3-12.
- [29] 徐劲. 教育出版的未来模式——基于超媒体技术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出版[J]. 出版发行研究,2021,(1):36-42.
- [30] 杨港,彭楠. 数字时代高校外语教材研究的自传式叙事范式[J]. 当代外语研究,2021,(2):96-105.
- [31] 杨莉芳. 大学英语教材形成性评价活动研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23,(4):82-89.
- [32] 曾斌,刘海溧. 我国数字教材建设与应用的探析[J]. 科技与出版,2023,(2):62-68.
- [33] 赵舒静. 基于纸质媒介与数字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新探——“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的融合创新之路[J]. 外语界,2018,(2):93-96.
- [34] 赵雯,刘建达.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内容重点研制与阐释[J]. 外语界,2022,(3):12-19.
- [35] 祝智庭,罗红卫,王诚谦,故姣. 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创新[J]. 外语电化教学,2022,(4):7-17.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